

壹、前言

清道光 22 年（1842）中英鴉片戰爭後，雖打開清朝門戶，但直到同治元年（1862）朝廷才開始推動洋務運動，設立語文學堂、技術學堂及軍事學堂，以圖自強，但並未確定以何國教育為師。從教育的角度觀之，當時主要對手是英國，對其教育的認識如何？是否有所學習？值得探究。光緒 2 年（1876）首派郭嵩燾出使英國，他及副使劉錫鴻、翻譯張德彝都留下有關教育見聞的日記或筆記；之後的外交官員也有類似紀錄傳世（周愚文，2016）。這些資料，有助於清人去認識當時英國的國情與教育。除了這些人的親身見聞紀錄外，事實上，自晚明以降已有一些傳教士所編撰的書中提及英國，例如明萬曆 30 年（1602）利瑪竇（M. Ricci）的《坤輿外國全圖》中，將 England 譯為「諳厄利亞」（李棟，2013, p. 62）。天啟 3 年（1623）艾儒略（G. Aleni）的《職方外紀》卷二記，「諳厄利亞」¹分三道，共學兩所，分 13 院（謝方，1996, p. 103）。其中兩學當指牛津及劍橋兩大學。之後南懷仁（F. Verbiest）《坤輿全圖》及《坤輿圖說》中將英國譯為「昂利亞」，但介紹均略（李棟，2013, p. 63）。但馬廉頗（2003, pp. 42-43）指出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介紹西方時對英國或甚少或忽略，是因新舊教之爭。雍正 8 年（1730）陳倫炯（1958）《海國聞見錄》〈大西洋記〉，稱「英圭黎」。乾隆 12 年（1747）《清朝文獻通考》卷 298〈四裔考〉稱英吉利，一名「英圭黎」（乾隆官修，2000, p. 7471）。乾隆 16 年（1751）印光任與張汝霖《澳門紀略》稱英吉利，卻誤以為從荷蘭分出（趙春晨，1988）。馬廉頗（2003, p. 25）指出早期介紹英國及西方諸國的著作不多，但錯誤不少，因譯音不準常把不同國家民族張冠李戴，英國的地理位置也常被搞錯。而樊守義康熙 46 年（1707）隨傳教士遊歐，返國後著《身見錄》，當是中國人第一部遊歐記，其中提及英國（李棟，2013, p. 65）。後粵人謝清高（安京，2002, pp. 250-251）於乾隆晚期（1782-1796）間遊歐，後著《海錄》記英吉利國事。且在官員出使英國前，19 世紀以來已有一些傳教士及清人編譯的西方史地書籍出版，另也有一些紳民遊英的紀錄，這些資料有助於時人認識英國；而透過這些資料，也可以讓今人探究當時清人對英國教育的認識程度。準此，本研究將探討這些早期介紹英國的資料，瞭解在戊戌維新前，究竟提供了多少英國教育的訊息。

再者，對於這段史事的檢討，還可從比較教育學發展的角度為之，因此期的狀況很類似其發展第一階段「旅人故事時期」（period of traveler's tales）²（沈姍姍，2000, p. 32；楊國賜，1975, pp. 1-2），透過比較可分析中國近代教育移轉（educational transfer）時教育借入（educational borrowing）的情形。

¹ 本研究所引英國人名及地名之中譯，均係當時所用，彼此不一且許多與今日有別，可知時人理解不易。又所有英文係作者查附。

² 此期特徵是，主要透過觀察，遊歷海外人士，常將遠方異國生活所見所聞，以遊記體裁向國內報導，但大多數海外教育遊歷報告，都是主觀感受與零散的記載。

最後，就當時中外關係言，從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前，清人對外人是抱持仇視態度，直到甲午戰敗後才開始轉向西方積極學習，特別希望透過日本經驗學習西方。因同時期遭遇外侮的日本，同治 7 年（1868）明治維新時，即派大批官民留英學習，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曾在日記中記錄，並寫信向李鴻章報告中國相對是落後日本許多（周愚文，2016），故有必要瞭解當時清朝的狀況。本研究主要根據當時出版介紹西方的史地書籍及紳民遊歷英國的日記或筆記進行分析，從中歸納時人對英國教育的認識程度，最後提出結論。

貳、可用史料的分析

本研究所用的史料，就種類言，主要有 19 世紀前期西方新教傳教士及清官紳所編譯介紹西方或英國的史地書籍，以及咸豐朝（1851）以後紳民遊歷歐英的遊記。這些資料有些是單獨出版，有些是被收錄在時人編輯的叢書中。就單獨出版的史地專書言，傳教士所編較早者，有英牧師米憐（W. Milne）所編《全地萬國紀略》，原分載於嘉慶末道光初（1820-1821）之《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道光 2 年（1822）於馬六甲刊單行本，書中英國稱「應蘭得」（鄒振環，2007, p. 37）。之後有普魯士牧師郭實獵（K. F. A. Gützlaff，又名郭士立）所編《大英國統志》，道光 14 年（1834）於馬六甲出版（莊欽永，2015）。³李棟（2013, p. 77）稱應是第一部簡明英國史。英牧師馬禮遜（R. Morrison）父子共同完成的《外國史略》於道光 27 年（1847）刊印（鄒振環，2007, pp. 78, 86-87）。而慕維廉（W. Muirhead）所譯的《大英國志》，是依據英米爾納（T. Milner）《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原著編譯的，咸豐 6 年（1856）上海墨海書館刻印，鄒振環以為是第一部由英學者編譯反映英國朝代興廢的歷史，將有關英國歷史最新、最準確的第一手資料帶給中國讀者（鄒振環，2007, pp. 126, 147）。關於清官員所編者，如林則徐的《四洲志》；之後魏源以林書為基礎，再行蒐集與補充而成《海國圖志》，⁴ 50 卷成於道光 22 年，次年出版，再續增至 60 卷，咸豐 2 年（1852）增補至百卷，後又多次重刊（魏源，2011, p. 1）。其中 50-53 卷介紹英國狀況（魏源，2011, pp. 1397-1493）。徐繼畲所編纂《瀛寰志略》，該書最早的刊本是道光 28 年（1848）福建巡撫衙門所刊，全書共 10 卷（宋大川，2007, pp. 11-13）。至於晚清人士所編的史地叢書，重要的有王錫祺所編，於光緒 17 年（1891）出版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王錫祺，1962）；光緒 20 年（1894）出版補編、光緒 23 年（1897）出版再補編（王錫祺，1964），其中收錄多種中外人士介紹英國史地的資料。茲

³ 根據莊欽永（2015）考證該書有兩版均於道光 14 年出版，一藏美哈佛燕京圖書館，一藏英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圖書館，兩版書同名，內容卻截然不同，莊書收錄兩文本並作校注，本研究兩版均列入分析。

⁴ 百卷本，卷 51-53 抄錄他書依序有：《英國論略》、《貿易通志》、《職方外紀》、《萬國地理全圖集》、《地球圖說》、《地理備考》、《外國史略》、《皇清四裔考》、《海錄》、《英吉利國夷情記略》、《瀛寰志略》、《記英吉利》、《英吉利小記》、《臺灣進呈英夷圖說疏》、《英吉利地圖說》等，其中多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亦收錄。